

Y157.5

鞍山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鞍山市委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目 录

鞍钢恢复初期地质战线的日日夜夜·····	李鸿业 (1)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几件事的回忆·····	张荣泳 (9)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前后六年·····	耿精一 (28)
国民党统治时期鞍山的三次学潮始末·····	董 进 (50)
一场“罢教”斗争的经过·····	刘守城 (58)
关于“安东事件”三份资料 ·····	孙凤恣 周慎 兰石 (63)
我的艺术生涯·····	喜少莲 (70)
我在国民党空军的十年·····	廖 维 (78)
伪满长春陆军军官学校·····	孙景大 (86)
“五卅”惨案后沈阳几个学校联合反对日、 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概况·····	金玉清 (97)
孟关切路·····	秦福基 (107)
被遗忘了的明边古城·····	刘景玉 (112)
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·····	邱秀虎 (115)
千山道教庙宇·····	景喜荣 张福耀 (140)
来信照登 (摘要) ·····	编辑部 (161)

鞍钢恢复初期地质战线 的日日夜夜

李 鸿 业

鞍钢是中国重要钢铁基地。过去总产量一直占全国四分之一，有趣的是，保证鞍钢的铁矿储量，也约占全国四分之一。我作为地质工作者，当看到鞍钢的欣欣向荣，并在发挥巨大作用的今天，喜悦之情，是难以言喻的。与此同时，在脑际也不禁浮出当年的日夜苦战和艰苦斗争岁月的动人情景，可以说在那时人人奋战、个个争先，献计献策、献交器材，爱国家、爱企业，蔚然成风。老英雄孟泰事迹的出现，就是这个时代鞍钢和矿山工人英雄事迹的真实写照。

—

我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从安东（今丹东）科学院调到鞍山，那时鞍钢刚刚开工。由于前期长期停工，地质勘探设备零乱不堪，各矿的地质资料散失一空，百业待举，百事待兴。

恢复鞍钢炼出钢铁，首先急需的是钢铁的粮食——铁矿石。当时恰恰是革命战争刚刚结束，工厂和交通被破坏得十分严重，贫矿的选矿不能马上复工，“粮食”只有需要富矿了。而富矿又远在吉林省的大栗子和七道沟，交通困难，运

不出来。近处的弓长岭铁矿，系井下采，更需一定的时间才能出矿。因此采矿部就决定在鞍山市区的小房身和大石头采富铁矿，然而这里的地质条件复杂，必须从地质工作入手，亟待积极行动，解决铁矿石问题，以保证高炉生产。

人是决定因素。可喜的是原鞍钢的钻探技工，大部份都能找到。他们都是钻探能手，积极性高，工作起来，十分出色，在很短的时间里，把破烂旧品组装起来，命名为“鞍钢第一号钻机”（能力300M深）。一九四九年十月第一个钻机在大石头开动，谷恩凯任队长，李玉鳌负责计划供应，下有李世福、相忠秀、李富山、李永林、刘宝田、刘永久、张明臣、王富仁等十人，很快开了钻。队员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，很有办法，又深知增产节约的重要意义。那时汽油奇缺，他们镶嵌钻头时，用木炭火代替喷灯。伪满时仅剩下的硬质合金钻进口材料用完了，在当时从国外买不到的情况下，就用铁铸砂代替，这也算一件创造。

开工不到十天，钻进三十米处，循环水突然变红，接着上来一段Fe55%的富铁矿岩心，全场人员欢声雷动，因为这里的富铁矿是震旦纪底层石英岩，和上层赤色页岩间的层状或扁豆状赤铁富矿，一旦受到钻具撞磨，便出现红色循环水，成为打到富矿前的予兆。在这喜庆的时刻，地质人员和工人感情融合在一起，共庆胜利。采矿部主任王文和工程领导人胡科同志，对我们做了大会表扬。不久工人们又修出第二台、第三台钻机。当时人员不够，于是又招进一些新徒工参加工作。老工人不仅承担繁重的生产工作，还肩负起培养徒弟的任务。由于新社会形成新的师徒关系，师傅认真教，徒弟努力学，徒工们很快就能独立工作。此时，我

也注意到本地人和外省人的团结。有一次我好不容易从七道沟招来一名曾经干过千米深钻，有经验的老技工，可是来了还未到一星期，便不辞而别。后来我意识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帮派意识在作祟，于是加强了对以后从阜新招来的孙祥、敖金生等人同本地人的关系的思想工作，共同提高了觉悟，感情十分融洽，很快安心工作，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团结，工作也顺干了。

采矿工作，安全生产是首要的问题。我很担心众多徒工，随时有被“给进把”打伤脑袋和“转动轮”绞衣的危险。除了及时安装防护罩等措施之外，责成李玉鳌同志写出一本简易规程，约三千字，油印出来，发给大家学习，严格遵照执行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冶金部黎彤同志来鞍检查工作，他笑着说：“这是冶金系统第一本规程啊！”

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，也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。当时煤田局办了学习班，于是就选几名有文化的徒工去学习。他们学完回来后当老师，再给大家讲课。对共同提高理论和技术水平，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当时工作条件太差，物质极其缺乏。后来有了帐棚，也很简陋，没有水管送水，大量用水由人挑，由于新工人的增加，也常常发生钻孔井下事故，主要是井下坍塌，夹钻。队长谷恩凯总是以身作则，以厂为家，始终站在工地上亲自指挥，这样不但及时处理好故障，也培养了新工人掌握技术，和应付各种故障的能力。

工作环境十分艰苦，晚上交接班，不管寒风刺骨的冬天，还是酷暑难耐的夏日，总是一把水，一把泥的苦干。人们以自己光荣岗位而骄傲，人人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累

中有乐，苦里带甜。有一次在机声隆隆的工地上，时逢盛夏，四周蛙声聒耳，场内灯火辉煌，群蛾飞舞，我忽而看见一支穿红马挂的蛤蟆，这位不速之客，凑热闹地进入工地上的人群中，吞吃着它的美味佳肴——飞蛾，似乎在等待着祝贺我们的胜利。工人们逗趣地说：这位客人，很守信用，准时来，准时走，成了我们的朋友。原来工人们用岩心编号的红铅油，涂在蛤蟆背上，作为标记。

我很怀念我们的钻探工人，和我最初参加这项工作的十位老战友，有的人如李世福、谷恩凯等同志，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们确是当时工作的功臣，不但把他们的技术传了下来，也把一心为公、艰苦奋斗的好思想、好作风传了下来，直接地、间接地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技术工人，在完成鞍钢任务的同时，也有力地支援了祖国各地，黑龙江、福建、四川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北、广东、新疆的采矿战线都有鞍钢人并成为主要战斗力。以上十人后来大都成为处、科级干部，为国家建设事业做出贡献。

二

地质资料是生产中的眼睛，是矿山设计和规划的重要依据。地质工作者的贡献就在于调查和编制地质图件和资料，弄清矿床形态、储量和品位。可是在解放初期，这些资料不是未曾有过，就是已经散失，基本上是空白。这就需要在野外从头做起。然而当时我只有助手马文广、王有生、曹大曾等人，不敷工作需要。后来来了高文太、戡象天，以后又离开了。当时办法：一是亦官亦兵，官兵一致到野外干，二是

选拔有文化的青年边做边带。同时也注意到正规学校培养，并把当时从事测量工作的年青人，从工作岗位上抽下来送长春地质学院学习。

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，除在大石头、小房身继续找富铁矿外，更挤出时间，开始着手几个主要铁矿山的地质工作。然而由于矿山多，工作时间拉长，乃请中央计划委员会地质专家队协助。该队总队长佟城，副队长李春显，下设桃园组，李春显、沈其韩并有本公司高文太参与工作。鞍山平原组王朝君、邢抚安。弓长岭组程裕琪（著名地质学家，曾任地质部副部长）李毓英、赵贵三、沈叔和、翁礼巽、李静仁、潘国祥，并有本公司曹大曾参与工作。七道沟组有岳希新、刘然和本公司的戴象天。大栗子组有叶连俊、刘鸿允、沈永和、秦乃、常景新。各组除了有我公司人员参与工作外，对系统采样工程，由马文广、王有生负责，测量、化验都由本公司配合。

这些地质学家，理论水平高，工作认真，解决问题快，往往工作至深夜。我们离开工地后，地质报告、图纸和数据，当年完成。这样不到一年，鞍钢各铁矿的资料都就齐备了。

一九五〇年冬，中国和苏联达成了协议，为了恢复鞍钢，派来了苏联专家设计组。其中有地质专家耶非莫夫。他们认为鞍钢如何恢复和发展，要看资源保证程度。但当我们摊开地质资料向他们介绍情况时，他们惊奇之余也表示很满意，我们不但有图纸资料，还有系统的品位控制工程，可以作为初步设计的依据。于是选定了大孤山、东鞍山、弓长岭三个矿区，后来成为鞍钢初步设计120卷的组成部分。为此我

深感过去我们分秒必争地抓了工作，争取宝贵的时间是多么重要，如果在解放之初，稍微忽略了这些，势必影响恢复鞍钢的设计工作，进展上的推迟，也许是一年。

这批资料由于没有钻探工程控制，按苏联设计要求，只能作初步设计依据。在技术设计时，要在此基础上补充采矿工程。如巨大的大孤山铁矿层，按他们的要求，就需十几个钻孔，还要在山脚下打巷道通过矿层。至于弓长岭，则工作量更大了。由于钻探队伍力量薄弱，我和他们商量，东鞍山改用坑探，因当时钻硬岩层还没过关，坑道反而较先完成。按当时施工力量，只能先进军大孤山。在东北地质研究所和有色局的支援下，共凑了六、七台钻机和施工力量，于一九五一年冬开展了大会战，那时山上山下，机声隆隆，车水马龙，真是地质勘探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盛大景象，无论在何方面，远远超过了过去水平。

过去的地质工作，用钻探量甚少，主要搞地质推断，因此对苏联专家上述要求，感到想不通，当时的要求是：凡专家建议必须执行。然而从实践中体会到，这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产物。有些因素有时是随机的，为了保证矿山建设后不落空和避免失误，不容丝毫冒险。我们对不同矿床又定下了不同密度和钻孔，成为今天勘探规范重要组成部份。在报告内容中，不但对矿床形态、储量、品位要有落实，又要提出水文、矿石工艺试验等众多工作成果内容。可以说这种从地质理论上升到完全为生产服务的主导思想，使地质工作出现了新的质的变化，成为了现今地质勘探程序的开端。不应忘记我国正规的地质勘探队伍，在冶金部系

统中形成较早，这也是和当时领导的重视分不开的。记得，当时我把以上地质勘探所需要的工作量汇报给东北重工业部袁葆华（今国家经委副主任）同志，他很惊讶而又有远见的说：“这不得了！发展工业必须壮大地质队伍。同意你们订购国外钻机和器材，但你们要注意钻孔地质资料的记录，每个孔都是地球内部的宝贵资料啊！”由于国家的重视，冶金部不久在一九五三年即成立了地质司，建立和加强了各地的地质机构和与之相应的队伍。鞍钢成立了地质处。

三

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，我们不但承受了地质工作勘探工作的压力，更为困难的是，一九五一年又增加了鞍钢工厂区的恢复工作中必须承担的大量任务。由于鞍钢全厂设计的需要，要测百分之一的地形、地物图，每五十米要有一个水准点控制。工作量大而时间紧。为了弄清厂内外地下管道位置，并标在图上，要用数百人进行挖掘工作，从首山水源地到厂区距离二十公里，又要进行水文地质工作。大型、无缝两个轧钢厂的厂基，还要搞工程地质，工作量大而杂，有许多是我们过去所不熟悉的新内容。然而这些艰巨任务，对这个新的“嫩芽”不但压不倒，而是雨露滋润，在工作中很快就壮大起来。

我们的办法是从已有的队伍中，能带的就带，如测量技术工作，我们是可以掌握的，从工作中带还做得到、来得及，但这个时候，有了战士却缺枪，我采纳董士奇的建议，到各城市买旧仪器，以拆、补、修方法解决了这一难题。在忙

乱中，还要保证质量和各图板相互准确的衔接，又建立了工作和成品的检查制度，统一了方法和质量标准。

物探是地质工作的重要帮手和新技术。因为没有专业人员，于是抽出从测量大学毕业的徐济民和物理大学毕业的梁志栋等人，向东北地质研究所顾功叙（后来任地质部物探局局长）王敬克物探专家学习，成立了物探组。当时在冶金部来说，又是较早的单位之一。

工程地质最伤脑筋。我们的办法是盯住下达任务的苏联工程地质专家，把方法要求问到底。又派人到有此工程经验的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去学习，或请工程师来及时解决了不扰动采土样器问题。

首山到鞍山水文工作面积大，由于土层坍塌，岩心钻机又难于钻进砂砾层，施工一时陷于极度困难，后来才知道过去有打冲击钻方法，于是解决了当时的急迫问题。后来在繁忙中也有创造，例如，在挖掘地下铸铁管位置的工程中，由于工程量大，请王敬克用找铁矿的磁力仪探索，结果很有效，还能计算出深度。

当时任务那样重，工作又无经验，为什么能完成任务和创出奇迹呢？归根结底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，有志气，有才干，艰苦奋斗的结果。

以上基本是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二月鞍钢地质处成立前，鞍钢采矿部地质科和鞍钢设计指挥部地质室时期的工作情况，即我任地质科长和任地质室主任期间地质、钻探、测量、水文工程地质综合队伍已形成，约一千余人，他们不但在鞍钢恢复时期起了重要作用，也为此后鞍钢地质处的成立，打下了基础，以后还将水文工程地质和部份测量力量留

给鞍钢设计院和铝镁设计院。鞍钢恢复时期的日日夜夜令人难忘。坚强的鞍钢地质队伍，便是从这个大熔炉中锻炼出来的。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几件事的回忆

张 荣 涤

1935年我在北平弘达中学二院念高中三年级，“一二·九”后，我被选为出席学联会的代表，先在学联会任宣传干事，“一二·一六”后任执行委员，第一中学张铭和汇文中学邓声阶（邓力群）为宣传干事，这以后我参加了南下宣传团；接姚克广（姚依林）办学联日报；参加了“三·三一”抬棺游行；“六·一三”市民大会；暑期夏令营；最后被民先队派往西安学兵队参加了西安事变。现将有关经过叙述于后。

（一）南下宣传团

经过“一二·九”、“一二·一六”两次大的示威游行，各校总罢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，这时国民党当局采取了提前放寒假的办法，限令学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一律离校，企图分散学生，使学生运动失去群众力量而瘫痪。

在这紧要的时刻，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于十二月十五日发表了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学生和全国青年同志宣言”号召青年学生“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！到工人中去！到农民中去！到商人中去！到军队中去！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，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，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，实行全国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各行各业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！”给学生的抗日运动指出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和正确的道路。

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，决定利用学生罢课和放寒假的时间组织南下到农村去扩大宣传，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抗日救国的人民运动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学联会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开会，由郭桂英（郭明秋）任执行主席，讨论到农村中南下宣传还是到南京去请愿，要求政府抗日。大家回顾了“九·一八”的历史教训，“一二·九”及“一二·一六”的大示威游行的经过，认识了只靠请愿是不能促使政府抗日的，又认识到只靠学生单枪匹马的搞斗争也不行，因为学生不是主力军，必须靠占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，他们才是抗日救国的主力军。学生的斗争要和工农大众结合起来，必须唤起民众，形成全民抗日大联合，才能打败侵略者，拯救中国。

通过讨论大家意见统一了，决定到农村去，三六年一月初开始行动，北平大中学校学生组织三个团，第一团以北京大学为首，包括东城各大、中学，团长韩天石；第二团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为首，包括西城各大、中学，团长是徐××，我校编在二团；第三团以清华大学为首，包括燕京大学，朝阳大学，辅仁大学等校，团长是黄华和蒋南翔；还有第四团

是天津的，他们以北洋工学院为领导。这次报名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都是“一二·九”和“一二·一六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。总指挥是彭涛、董毓华和宋黎。董毓华告诉我是常委，具体任务是打前阵，为全团人员安排食宿。

我团主要成员记得的有王成锋（金铁群），弘达一院的霍继先、温景亮、李家骅、吴绍文、王泽光，师大的杨连英、武尚文、曹国芝，镜湖中学的傅先甲，男附中的袁汝庸，艺专的李蓬荆，弘达二院的周庆荣（周宜民），女附中的杨锡钧、刘芝兰、贝锦玉，女二中的杨瑞先，女一中的黄彤光，汇文中学的邓力群、钟国元，还有陈泽荣、阎世臣、王介三、王宝贵、杨丙辰等。

第一天住在青云店，同学们走了一天，生活完全变了，在学校吃的是大米白面，荤素俱全的菜，住的是明亮暖和的宿舍，而今天吃的是大饼咸菜，住的是冰凉的地下或大炕，只铺着薄薄的一只线军毯，学生们一致认为为了扩大宣传，先要过好生活关。农民们不识字，怎样讲农民话也是一个困难，同学们在冷得睡不着时，就低声地哼哼着明天的宣传歌曲和考虑如何向农民宣传。

白天召集了广大群众向他们讲演，同学们愤怒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，以及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抗日，还向日本妥协，要让日本和汉奸搞“华北自治”，成立了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，眼看中国就要亡国了。有的东北同学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强盗占领家乡的悲惨情况。同学们帮助小学和简易师范的教职员筹备了救国会，第二天队伍高唱着时事打牙牌歌继续前进，歌中唱道：

中华民国二十年，

九月十八那一天，
关东起狼烟，
哎咳哎咳哟！
关东起狼烟。

三队经过窰店火车站，这时正好有一辆客车停着，同学们上车向乘客们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，并在车皮上贴了宣言和标语。晚上到良乡在城外小学向师生宣传北平学生运动的真象，这时还有其他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来参加，宣传团和他们一起座谈讨论并帮助教职员成立救国会，也有镇上的邮政局长，公安局长和商会会长参与筹备救国会。

学生们绝大多数都是城里人，经过了十来天在农村与群众接触，了解了农民的痛苦和被剥削的悲惨状况，很受教益。

四个宣传团到固安城集合，我在台上向群众讲话宣传形势，被记者照了像，后来登在永生杂志（或是大众生活）的封面上了。

固安简易师范的校长王雨山是地下党员，他听到宣传团来的消息，领着部分学生到宣传团住处去并主持了欢迎会，他热情地赞扬了宣传团的学生们，并愤怒的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，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，他振臂高呼：“团结一致抗日救国”！大家随之高呼，群情激愤。会后王校长带领简师学生设法进城，到街上为宣传团募捐，把捐款和食品及被褥等用绳子捆好，从城墙上送下来。同时他们在城中开了抗日救亡宣传会，贴出了“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！”及“欢迎南下扩大宣传团！”等标语，他们的行动，也大大鼓励了宣传团的斗志。

宣传团深入到农村中去向他们讲为什么受苦，又讲到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和东北沦亡的悲苦生活，通过街头喊“打回老家去”，大家不约而同的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，农民们也有的上台控诉，有一位受苦的老大娘上台高喊：“我们不许日本鬼子来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十个杀十个”，宣传团还教儿童们唱革命歌曲。

学生们在农村宣传了十来天，也躲不过军警的侵扰，二团在大辛庄被围，我们有二、三十人突围，走了一夜不认识路了，遇到中山中学的学生，他们说这里是霸县，大家乘汽车到天津转乘火车回到北平。

（二）办学联日报

南下宣传团回北平前，学联日报是由学联文书姚依林办，地址在汇文中学地下室，由大学出版社印刷。我回北平后，姚告诉我大学出版社不能再印了，他给我二百元钱，让我接着办学联日报，并另找地方印刷。

我和镜湖中学刘铁铮负责编辑，由我把稿件送到西河沿一个小出版社付印，我等着大样出来立即校对。不久汇文中学被搜查，也不能再呆了。我们搬到中国大学继续办报，一天警察搜查中国大学，学联日报稿件还在校内，我骑车从校门出来绕到校后墙外面，观察外面的情形，约好我掷一块石头进去表示外面无事，可往外掷学联日报稿件，掷两块则表示外面有人，不能往外递稿，我掷了第一块石头，正掷进第二块之际，可刘就把学联日报稿件捆捆出来了，这时即有警察过来，我拣起报捆赶快骑上车跑到红庙师大附小门口，这

时正值中午放学之际，我趁热闹跑到成城中学，把车放在校内存放起来。事后知道刘铁铮在中国大学被捕了，我在成城中学由二年级一位同学张××领我从地质部出来，我们想到西河沿印刷厂去送稿件，但发现有人跟踪，我们就没有进去，张某带我雇了两辆黄包车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去，想躲开跟踪的敌人，但他们也乘车跟在我们后边，我俩在各个妓院转了几趟，把敌人甩开了，我就自己回煤市街漳州会馆我的住处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和姚依林把油印机带到中山中学附近一个小饭馆，由中山中学一个同学领我们从厕所跳墙进去，但该校也不能呆，就又从原路出来到华北大学，由该校同学王镛接待我们。在这里魏宜咸（肖魏）和李桂英（谷羽）也去过，后来魏宜咸和王其梅被捕，这批人散了，这段时间学联日报就停办了。

（三）暑期夏令营

北平学联和民先队总部，为了争取团结一切爱国青年学生，于1936年到1937年间，联合举办了数次夏令营，学生们在夏令营学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，听进步教授的专题讲演并进行军事演习。

民先队通知我参加的第一期夏令营，时间是1936年7月，地址在卧佛寺上面的樱桃沟，挑选的学生都是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。

我记得我们是在平大农学院集合，前面有男生打着露营的旗，出发时学生自带行李，自备食品（米、面），我因天

热没带行李，只带两件衣服，有的女同学两人抬一个小行李卷，她们有的穿白上衣，黑裙子，足登白鞋。这些是女一中、女二中和师大女附中的学生；有穿羽白色旗袍的，这些是大学生或私立中学的女生；男生则穿衬衫和长裤了，食品袋是由男同学轮流扛着的。

到了露营地同学们自己动手搭帐篷，大家非常兴奋，边搭边唱革命歌曲：“枪口对外，齐步向前，不伤老百姓，不打自己人，我们是铁的队伍，我们是铁的心，维护中华民族，永做自由人……”歌声此起彼伏。学联和民先队还印发了“行军日报”，第一期是1936年7月12日印的，内容有新闻及转载等。

白天进行军事演习，先请人作报告，听完就爬山做游击战术的演习，晚间开会讨论战情，虽然白天同学们累了一天，但晚间发言仍很激烈；有时请进步教授向学生们做专题讲演，我们第一期有平大法商学院教授曹靖华和施复亮来讲过，学生听完讲演，大家就围坐在石头块上开座谈会，学生座谈是热烈的。吃饭是在山上找茅草或树枝用石块搭起锅自己做来吃，虽然做的比校内的伙食差，可是大家自己动手做的，所以吃的很香。

这第一期有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名学生，在山石上篆刻了“保卫华北”四个大字，表明抗日决心。这块山石多年经风吹上埋被土盖住了，1983年北京团市委到那里去纪念“一二·九”四十八周年，经老同志指点，大家挖土找到了这四个大字，后来决定“一二·九”五十周年的纪念亭就立在樱桃沟。纪念亭落成时，当年的老同志邓力群、宋黎、李宝华、袁宝华、郭明秋、谷景生、孙敬文、陆瑾、耿飚、